

# 韩国的战后小说

牛林杰

**摘要:**韩国的战后小说在韩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战后小说反映了当代韩国的一段重要历史以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战后小说对时至今日韩国的当代小说仍有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韩国文学;战后小说;传统派;新世代作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36(1999)01-0058-05

韩国的战后小说是指 1950 年韩国战争爆发以后出现的以反映战争和战后状况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作品,而不是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韩国小说文学。时至今日,在韩国以韩国战争和南北分裂为题材的小说仍在不断出现,但已不属于战后小说的范畴,因此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指称的战后小说其范围仅限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发表的作品。

韩国战争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灾难性的。政治上的独裁统治,战后经济的极度凋零,美国军队的驻屯,西方文化的浸入,嚣张的反共宣传……这一切都给韩国的战后小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般来讲,韩国的战后小说可以分为传统派小说和战后派小说。传统派的作家中有一部分在战前就已经登上文坛,并发表过很多作品,甚至还在当时的文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传统派也有一部分作家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登上文坛的,他们的共同特点主要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技法进行创作。战后派则主要由在战争期间或战争后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组成,他们声称自己是战争的体验者和受害者,对人生持否定态度,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认识去描写战争,他们对现实不满,愤世嫉俗,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意识,他们对传统的创作方法不屑一顾,竭力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因而被人们称为“新世代作家”。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时韩国战后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传统还是战后派,他们

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敌视共产主义和北朝鲜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于李承晚政权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宣传所造成的,在阅读韩国的战后作品时,我们应该透过这一表面现象看到作品所反映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战后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反抗意识等本质。

广义的战后小说除了指停战后创作发表的小说作品之外,还包括战争期间发表的战时小说。战时小说主要是由老一代的传统派作家创作的,其代表作家有廉想涉、李无影、金东里、黄顺元、朴荣浚、安寿吉、郑飞石、韩戊淑、康信哉等,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作家了。战争期间他们大部分加入了从军作家的行列,创作了一些战时小说,较有代表性的如廉想涉的《解放的清晨》、《骤雨》,黄顺元的《曲艺师》、《鹤》,朴荣浚的《游击队》,安寿吉的《第三种类型的人》,康信哉的《眼泪》,柳周铉的《败北者》等。这些作品为后来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创作原形,对战后甚至六十年代的小说都有一定的影响。

黄顺元(1915—)是老一代传统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出生于平安南道,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英文系。黄顺元最初是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1931年在《东光》发表《我的梦》一诗后,陆续出版了《放歌》、《古董》两本诗集。1935年开始在《三四文学》发表诗和小说,1940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沼泽》,此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黄顺元在韩国战争期

间及战后发表的代表作品有《曲艺师》、《鹤》、《被遗忘的人们》、《冬日的迎春花》等短篇小说和《该隐的后裔》、《人间接木》、《树木挺立在山坡上》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和韩国战争有关。《曲艺师》是作者根据自己在釜山避难时的亲身经历加工创作的。小说讲述身为汉城某中学教师的主人公为躲避战争携一家老小来到大邱和釜山，在避难地为求得一隅栖身之地而辗转反复，几经周折的故事。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韩国社会的混乱状况和知识分子的遭遇。黄顺元曾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也充满了诗的语言和情调。虽然《曲艺师》反映的是战争的悲剧，作者却采用了抒情式的接近方式，使作品充满了人情味儿。

安寿吉(1911—1977)是老一代传统派作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他出生于咸境南道咸兴市，1935年在《朝鲜文坛》发表短篇小说《红十字医院院长》和小小说《红围巾》，开始了创作活动。1941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集《北原》，战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三种类型的人》(1954年)、《初恋笔谈》(1955年)、《风车》(1955年)、《花环》(1955年)等多部短篇集。1959年至1967年间完成的五卷本长篇小说《北问岛》代表了安寿吉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1953年发表的《第三种类型的人》反映了小知识分子在战乱中的意识变化。主人公锡是一位作家，战乱中为维持生计到一所中学当了教师，勉强度日。有一天他遇到了昔日的老朋友现任某汽车公司经理的赵云。战前赵曾是一位个性十分独特的作家，极力主张维护文学的尊严性，因而深受人们的尊敬。主人公锡从赵云的谈话中得知，战争爆发后他抛弃了自己的信仰，从作家摇身当上了汽车公司的经理。赵云还谈到，在崇拜他的文学青年中，有一位名叫美伊的少女，才华出众，赵收她做了弟子。战争中美伊失去了哥哥，父亲又患了半身不遂症，最后她参军当了护士兵，踏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了解了赵云和美伊的命运之后，主人公锡陷入了苦闷，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既不能抛弃又不能忠实地履行作家的使命，于是他认为自己是战争制造出来的第三种类型的人。

战时小说根据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又可以分为战场小说和后方小说，根据主人公的

身份还可以分为军人小说和民间人小说。战时较有影响的军人小说有朴荣浚的《金将军》、郑飞石的《护士长》、李无影的《和大海的对话》等，民间人小说大多以描写在战乱中沦落的女性的命运为主要内容，如朴容九的《今日天气晴朗》、郭夏信的《胡同》等都描写了女性为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肉体的悲惨境遇。崔泰应的《姐妹》则向人们讲述了女大学生姐姐和女高中生妹妹为了维持生计双双沦为小偷的悲剧。战时小说具有明显的从军文学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只注重故事的转达，而在文体和技法上缺少推敲，再加上作品中充斥着作家们极端的政治偏见，大大降低了战时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在战后小说中的地位。

战争结束后，韩国文坛新人辈出，他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而对战后荒芜的家园和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发出了他们的呐喊。这一批年轻作家中有一部分人继承了上一代作家的传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为主揭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和战后混乱不合理的种种社会现象。他们被称为是继金东里、黄顺元等之后的新一代传统派作家。新一代传统派作家的代表主要有吴永寿、李范宣、金光镛、郑汉淑、朴景利、河瑾灿、宋炳洙、尹兴吉等，代表作品有吴永寿的《河边的村庄》、李范宣的《鹤乡的人们》、《误发弹》、朴景利的《不信时代》、河瑾灿的《白纸胡须》、《受难的两代》、宋炳洙的《小李金》、尹兴吉的《雷雨连绵》等。下面就新一代传统派几位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略作论述。

李范宣(1920—1982)是新一代传统派的代表之一，他出生于平安南道新安州，东国大学国文系毕业。1955年在《现代文学》发表小说《暗标》、《星期日》，开始了创作生涯。主要作品有《鹤乡的人们》、《蜗牛》、《误发弹》、《死亡保留》等。《鹤乡的人们》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鹤乡为象征，描写了江原道一个被称为鹤乡的偏僻乡村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故事是这样的：鹤乡的里长(相当于中国的村长)老伯和私塾的朴先生去面(韩国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乡)事务所各自送他们被迫当兵的孙子德和巴雨，在回来的路上，他们默默地坐在村后的山坡上望着村子，想起鹤不来村庄今

年已是第三十六个年头了。三十六年前，鹤开始不来的那一年，发生了国家被日本吞并的事件，从此鹤再也没有光顾过村子。正当他们沉浸于往回忆时，村里忽然传来了“鹤来了”的喊叫声，里长和朴先生半信半疑，急忙下山赶到村里看究竟。鹤真的回来了，而且正是他们年轻时见过的那一对。村里洋溢起一种欢快的气氛，因为人们知道这是要发生大喜事的征兆。果然过了不久国家就光复了，被拉去当兵的德和巴雨也平安回来了。此后连续几年，鹤每年都飞来筑巢生子，生三只鹤崽预示丰收年，生两只预示平常年，生一只则预示凶年。有一个鹤生了三只鹤崽，村里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可是有一天三只鹤崽中的一只从巢中掉落下来摔死了。人们议论纷纷，深感不安，觉得这是一个凶兆。不久韩国战争爆发了，巴雨参加了人民军，回村时用枪打死了一只鹤，剩下的鹤也都飞走了。战争越打越大，鹤乡的人们不得不去釜山避难，村里只有私塾的朴先生没走，他要等他的孙子巴雨。一年后，当避难的人们重新回到鹤乡的时候，村庄已变成了一片废墟。人们从里长的家里发现了朴先生的尸体，当天夜里，里长由于悲伤过度也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握住孙子德的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鹤，鹤树，鹤树……”。

朴景利(1926—)是韩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生于庆尚南道，1955年在《现代文学》发表处女作《计算》，步入文坛。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信时代》获“现代文学新人奖”，之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飘流岛》(1959年)、《金药局的女儿们》(1962年)、《市场和战场》(1964年)等长篇小说。她于1969年开始创作16卷本“人河小说”《土地》，受到韩国文坛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韩国当代文学的一颗明珠。《不信时代》描写了战后韩国到处蔓延的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主人公真英还未及擦干眼泪，独生子又死于医疗事故，使真英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她虔诚地相信了宗教，经常去教堂和寺院为亲人的亡灵祷告。可是在这些她认为神圣的场所，所看到的却是各种丑恶现象。这里有道貌岸然却心怀鬼胎的僧侣和信徒，也有出售假药牟取暴利的药店主，

到处都充满了虚伪和对金钱的贪婪。诚如《不信时代》这一小说题目所示，主人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了欺骗和背信的社会，作品中的故事尽管是生活中常见的平凡事，但作家却独具匠心，通过这些日常的素材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病弊。

1957年宋炳洙发表于《文学艺术》杂志的短篇小说《小李金》是他成名之作。作者在小说中告诫人们战争灾难是不区分大人和孩子的，作品的主人公小李金是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整日在美军基地附近流浪的孤儿，他已经不是战争前那个纯真烂漫的少年，他过早地看到了人世和社会的弊端，童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小李金失去父母之后，他曾在汉城手提铁桶沿街乞讨过，后被抓入盗窃团伙做事，因无法忍受盗窃团伙内的虐待而逃出来，可随即又被警察捉住送入了孤儿院，半个月后因为饥饿难当再次出逃，偷偷地爬上了路过的美军卡车来到前线的美军基地。当他来到前线偶尔得到美军吃剩的烤鸡腿或巧克力时，他便对美军产生了一种好感，甚至认为“虽然前线地区连一座象样的房子也看不到，但离开汉城来到这里还是来对了”。就这样他开始当起了美军的听差，经常向美军介绍一些因迫于生计不得不靠卖身过活的年轻女子。小李金满足于美军基地的寄生生活也是因为缺乏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小主人公的年幼无知所致，但真正的原因仍在于当时韩国的现实社会。

韩国战争给韩国的家庭带来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尹兴吉的中篇小说《霖雨连绵》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主题。作品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叙述了互为亲家的金氏和权氏两家因战争而产生矛盾和对立的故事。战争之前，奶奶和姥姥两家共同生活，关系融洽和睦。战争爆发后，叔叔金纯哲参加了北韩的人民军，而舅舅权伍文则当上了南韩国军的军官，金权两家的矛盾也由此而生。随着战争的进行，叔叔金纯哲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舅舅权伍文则战死前线。接踵而至的噩耗使奶奶和姥姥的关系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她们都将自己的不幸的原因归之于对方，原来融洽和睦的亲戚关系顿时变成了敌对关系。小说并没有就此止笔，

而是有意识地给不幸的双方提供了和解的转机,那就是在连绵的霪雨中蟒蛇的出现,这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因为按韩国的风俗,家里出现蟒蛇,一般被认为是死者的归还。奶奶和姥姥都相信蟒蛇的出现就是自己的儿子的归还,她们的敌对关系也因此得到了缓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因社会动荡而遭到破坏的人伦关系给予的热切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由于作者找不到使双方和解的客观转机,只好安排蟒蛇登场。这种以基于巫俗信仰的自然神论来试图化解现代战争和理念所造成的人伦关系的破坏,很难说是一种合理的方法。这里值得肯定的只是作者对作品人物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韩国的战后小说中,和传统派并驾齐驱的是被称为“新世代作家”的战后派,他们大部分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登上文坛的青年人,他们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积极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进行小说技法的革新和试验。对韩国战后派小说影响较大的西方作家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加缪、马尔罗、卡夫卡,也有早期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乔伊斯和伍尔夫等。

韩国的战后作家接受并大量使用西方现代派的小说技法与战后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在韩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现代派小说理论和技法最初传入韩国是在三十年代初,而一直到韩国战争爆发为止的近二十里,却没有对韩国的小说文学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到了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现代派文学对韩国战后小说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韩国于战后和西方许多国家建立了直接的交流关系,使西方的文化得以涌入韩国,这是外因;二是韩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普遍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这可以说是现代派小说在韩国传播的内因。

韩国的战后作家对现代派小说各种技法的接受,并非仅限于简单的模仿,因此他们的小说技法和西方作家又有所区别。比如西方意识流小说家在使用意识流技法时,意识流是作为主要的创作技法在作品中贯彻始终的,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等,几乎整部小说都是由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流

组成的。在韩国战后作家们的作品中,意识流技法虽然经常被使用,但大部分却已经不是作品唯一的甚至主要的创作方法,而是和其他技法结合使用。人物和故事仍被置于重要的位置,意识流只不过是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或主观感觉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战后某些小说中使用了意识流技法,就将其称为意识流小说。在韩国的战后小说中,除部分现实主义作家表现出了较明显的思潮倾向之外,新世代小说可以说是多种思潮综合作用的混合体,所以很难只根据小说技法的一些特征而将作品划分为各种流派。

由于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许多技法几乎是同时被介绍到韩国的,这给战后新世代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进行各种小说形式和创新的机会。故而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小说技法,而同一种小说技法又可以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见到。多种创作技法结合使用是战后作家特别是新世代作家们的一个特点,如张龙鹤的《约翰诗集》中就使用了寓言象征、意识流等多种技法,吴尚源的作品中也可以同时看到意识流技法、电影技法、讽刺技法等。

战后派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张龙鹤、孙昌涉、金声翰、鲜于辉、吴尚源、徐基源等人。较著名的作品有张龙鹤的《约翰诗集》、《非人诞生》、孙昌涉的《雨天》、《未解决的一章》、《流失梦》、金声翰的《青蛙》、《暗夜行》、《众生》、《五分间》、鲜于辉的《火花》、吴尚源的《犹豫》、《黄线地带》、《白纸的记录》、徐基源的《暗射地图》、《深夜的拥抱》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成了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流,韩国的战后小说受其影响很大。存在主义最初被介绍到韩国是在1946年,主要是通过美国和日本传入的,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法国和德国。当时对存在主义的介绍只能说是一种一般性、启蒙性的介绍,真正意义上的介绍则是到了战后由一批专攻欧美文学或精通外国语的新世代主导的,韩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也正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1955年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的《约翰诗集》是张龙鹤读了法国作家萨特的小说《恶心》后,受其影响而创作的。从《约翰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龙鹤对《恶心》的特征不论是

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很深的理解。《约翰诗集》的第一部分是篇寓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只野兔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山洞里，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它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境遇，从此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后来它不顾危险试图通过一条石缝爬出来，它的全身被划得鲜血淋漓，最后终于成功了。可是它还未及看清周围的世界，眼睛却因阳光的照射而失明，野兔随即倒在洞口死去了。后来在野兔倒下的地方长出了一只蘑菇，人们称之为自由的蘑菇。张龙鹤《约翰诗集》中的这个寓言象征着存在或自由这一小说的主题，这和萨特的《恶心》中的“Feuillet sans date”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张龙鹤是韩国存在主义影响较明显的代表作家，他的代表作《约翰诗集》不仅对他本人以后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战后其他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意识流手法在韩战后小说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吴尚源是使用这一技法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其短篇小说《犹豫》中使用意识流手法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被处决前内心世界的意识轨迹。小说是以主人公在监房回想其被俘的过程开始的，几乎整篇作品都是由主人公的意识流组成的。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实例看一看吴尚源是怎样使用意识流技法的。

白雪覆盖着堤路，啊！这堤路……有几个人在这堤路上走过了呢……原野对面的山丘，全是白雪。心胸感到豁然开朗。往前直着走吧，这是通往南方的路，不是你一直想走的路吗？你不会遗憾的。每走一步，雪地上就会多留下一个足迹，我要一步两步认真地走下去。射手准备！子弹上膛的声音冷若寒风，眼前只有白雪，没有任何他物。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直至最后一刻，应该认真地走到那终点，在最后的那一秒到来之前，我决不能忘掉自己。（《现代韩国文学全集7》，汉城，新丘文化社，1981年，第194页）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包含了意识流技法的多种特征。首先意识流技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交叉往复，上面的引文中既有客观景物的描写，又有内心独白，并且还有人物对话。初看上去似有一种混乱

的感觉，但仔细分析却没有任何的间断或不适的连接。另外在意识流技法中，为保持意识的连续性，有时会省略句子符号。上面例文中内心独白和人物对话的句子符号就被省略了，作者的叙述和人物的对话没有明确的区分，并且在省略部分句子符号的同时，还省略了对话的发话者，使整段文字如一幅画面一般以快速的节奏铺展在读者的面前。这不禁使人想起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第十八章的：“Penelope”中叙述女主人公莫莉的内心独白时近24000个单词没有使用一个标点符号的先例。

韩国在韩国战争之后的战后小说创作中积极接受并使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各种技法除了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之外，与当时韩国文学发展的阶段也不无关系。韩国的近现代文学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漫长时代之后，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变革、创新意识，要求文学的艺术原则、手法、风格更加多样，于是，人们很容易地把目光转向了积极进行艺术实验、创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结果战后文学形成了继三十年代韩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风潮之后的又一次高潮。

韩国的战后小说在韩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战后小说反映了当代韩国的一段重要历史以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战后小说对时至今日的韩国当代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今天韩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韩国战争和南北分裂一直是韩国当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可以说了解韩国的战后小说是理解韩国当代小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 参考书目

1. 辛卿得，《韩国战后小说研究》，一志社出版社，汉城，1983年；
2. 李在铤，《现代韩国小说史》，民音社出版社，汉城，1991年；
3. 尹柄鲁，《韩国近现代文学史》，明文堂出版社，汉城，1992年；
4. 赵键相，《韩国战后小说研究》，成均馆大学出版社，汉城，1993年；
5. 丘仁焕，《韩国战后文学研究》，三知院出版社，汉城，1994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